

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支柱
苏维埃是人民的政权

红色星火在城口燎原

核心提示

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李先念，生前在回忆录中写道：“川陕革命根据地东起城口，西至嘉陵江……”
位于重庆东北角的城口，是一片光荣的革命热土——
她是万源固军坝起义后城万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；
她是重庆地区第一个迎来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县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、徐向前、许世友等曾在这里留下光辉足迹；

她是重庆地区唯一成建制建立县、区、乡、村苏维埃政权的县，属全国一类革命老区，至今这里仍传颂着大量军民鱼水深、共同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的故事。
如今，城口在摆脱延续千年的绝对贫困基础上，正发扬光荣革命传统，继承革命先烈遗志，充分挖掘红色文化，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篇章。

□本报记者 罗芸

仲春时节，山如翠屏，簇拥着大巴山腹地的城口县城。

县城南门的碉堡梁，矗立着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石碑，上书“川陕革命根据地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”。

“城口是一片英雄的土地，这里的河山浸透了革命先烈的鲜血。”3月18日，曾任城口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的张合轩动情地告诉重庆日报记者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红军在城口用生命和鲜血传播革命火种；城口人民也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红色苏维埃政权，让革命之火在大巴山熊熊燃烧。

星火撒进巴山

在城口县双河乡柳树村庞家院子，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。阳光穿过黄绿色的新芽，星星点点地洒在树下的“城万红军指挥部”纪念碑上。

“这是一棵‘有来头’的树。”双河乡人大主席唐绍强介绍，当年万源固军坝起义前后，起义领导人李家俊曾在庞家院子开会，第一次将革命的火种带进大巴山腹地。

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，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。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，李家俊、王维舟等策划在川东组织农民武装起义。

当时，李家俊派人扮成“春信儿”，在城口、万源、宣汉交界的大山中，走村串户连麦带送“春牛图”。图上写着反抗封建剥削的歌谣：“要想不出款，就要拿枪杆；要想肚子填得满，就要团结起来干；要想衣服穿得暖，大家齐把豪绅铲！”

彼时，城口、万源等地的老百姓备受地主豪绅和军阀的欺压，每年缴纳的税款多达30多种，甚至连挑粪也要缴税。

1929年初，一群青壮年农民在庞玉必的发动下，在庞家院子自发成立了“青龙会”，开展抗捐抗粮斗争。

当时国民党军队身穿灰色制服，当地老百姓称其为“灰兵”。1929年春，固军坝起义前夕，李家俊来到双河发动群众参军参战。在庞家院子作宣传时，为防“灰兵”的突袭，“青龙会”设了远近三处警戒哨点。最近的一处哨点，就在这棵皂角树的大杈丫上。

1929年4月27日，固军坝起义爆发。起义领导小组宣布城口和万源的农民自卫军，农民抗捐军统一编为川东游击军第一路，开展武装斗争。同年6月，这支队伍改编为城万红军。

城万红军以固军坝为中心，广泛发动万源、城口等地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，提出要“废除租田制度，取消苛捐重税、打倒土豪劣绅，实行土地革命，建立农工政权”。1930年春，川东游击根据地发展到3000多平方公里，人口6万以上，队伍发展到3个支队、2000余人。

“李家俊一边练兵，一边组织地方成立农民协会（以下简称‘农会’），而农会则是地方苏维埃的前身。”唐绍强说，他的大伯唐兴才、二伯唐兴茂受革命思想影响，加入了李家俊的队伍，常跟着农会双河场分会主席白希仁，在场镇召开群众会议，深入村寨宣传革命道理。

与此同时，余坪、周溪、明通等地纷纷成立了农会。在农会的发动下，加入城万红军的贫苦农民越来越多。1930年3月20日，城万红军3000余人攻入城口县城，成为当时川渝地区被地方红军占领的首个县城，震惊全川。

1930年7月，在军阀与地方反动武装的疯狂“围剿”下，固军坝起义失败。庞家院子的百年老树也被反动武装视为庇佑红军的“神树”，纵火要将其烧毁。皂角树被大火烧焦了一半，依然坚强地存活下来。

火种逐渐燎原

庙坝镇位于城口南部与西部交通要道交汇处。离镇政府不远处的青山下，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小楼：歇山式屋顶、青色条石和青砖砌墙、拱券造型的门窗，二楼临街有一条长廊。

“这是解放前当地唯一的一座洋房，由大地主王丕基所建。”庙坝镇干部冯乔明说，小楼记录着一段光辉的历史：1934年2月和同年7月，李先念的红三十军与王维舟的红三十三军先后在此驻扎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32年12月，红四方面军入川，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。1933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在宣达战役取得胜利后，乘胜挥戈城口，解放了城口西南部地区。中共川陕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城口县委和城口县苏维埃政府。

就在这年冬天，国民党川军接连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“六路围攻”，城口是东线的重要战场。

1934年2月，红三十军负责东线突围。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的李先念，率领部队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八台山进入城口。

张合轩告诉重庆日报记者，李先念在城口战斗的时间不长，但城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时，听说财政部的曾国坚是城口人。他热情地握着曾国坚的手笑叹道：“城口的山好大啊！我在八台上打过仗，那时正下大雨，山陡路滑，打了一天把敌人赶跑了，晚上就在山上的庙里宿了一夜。”

在城口时，红军不仅行军作战特别艰苦，生活也十分困难。部队将领跟普通战士和百姓一样，只能靠玉米糊、野菜填肚。

即便条件艰苦，红军依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。1934年6月15日，王维舟率领红三十三军攻破城口县城，城口县城再度被红军解放。随后，红军摆出“打下夔巫”的架势。正在对以通江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“围剿”的四川军阀刘湘又惊又惧，从“围剿”的部队中抽调出超过红军4倍的兵力进攻城口、万源，以防红军威胁下川东地区（现万州至巫山一带）、与在彭水活动的贺龙部会合。

这一兵力调动打乱了刘湘原定的“围剿”部署，也正中红四方面军调敌于预定战场歼灭的计划。在城口，红

四方面军的第四军、第九军、第三十军、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和第三十三军5支队伍，与川军和地方土匪武装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，歼敌2000余人。

“城口所在的东线战场的胜利，为红四方面军最后粉碎川军‘六路围攻’，巩固川陕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。”张合轩说，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，不仅策应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，也为红一方面军长征北上大幅减轻了压力，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与此同时，红军在城口一边歼敌剿匪，一边开展根据地建设，发展党组织、建立苏维埃政权、训练地方武装。这期间，全县建立了5个区委、9个乡党支部和6个区苏维埃政府、24个乡苏维埃政府、80多个村苏维埃组织，形成了完整的县、区、乡、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。在红军战斗版图不断扩张、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，川陕革命根据地也成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。

“我家族有七八个人参加了红军，包括我的祖父冯贤忠。”冯乔明自豪地说，当时仅庙坝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就超过300人。

据统计，当时城口全县仅有5.7万人，其中就有近4000人参加革命，600多人参加红军。红军传播的革命火种，在城口已呈燎原之势。

革命热情燃烧

在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内，陈列着一件国家三级文物：象牙杆铜戥子。

这件文物以纯手工磨制的象牙为秤杆，以黄铜为秤盘。经过岁月的磨砺，白色的秤杆露出浅红，黄铜色的秤盘慢慢变黑。

“这是当年坪坝‘红军药房’草药医生周俊侯用来抓药称重的工具。它见证的是一段军民鱼水深情。”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馆长孙才兴说。

1934年4月，王维舟率红三十三军进入城口，常在庙坝、坪坝、县城一带活动。在指挥战斗之余，他常深入到农户家中了解情况，发现坪坝场镇及周边有3家药铺，老百姓却常因“鸡窝寒”等疫病失去性命。原来，这些药铺均为大地主蔡益所开，收费昂贵，穷苦人看不起。

1934年6月，王维舟召开坪坝区乡苏维埃干部会，并以苏维埃政府名义当众没收了这几家药铺；又在坪坝关

庙巷子内开设药房，亲自为药房题写“坪坝工农红军药房”的店名，聘请周俊侯为百姓治病，贫困人家看病免费。就诊的人多了，“鸡窝寒”对百姓生命的威胁也小了，红军被称为“救命活菩萨”。

“通过一件事，老百姓感受到红军是真心为穷人谋福利的，都真心拥护红军、拥护苏维埃。”今年76岁的坪坝镇议学村村民周英珍说。周英珍曾听婆婆龚玉珍说起当年的事：红军驻扎时，老人在井边洗衣服，红军会帮忙提水；龚玉珍和周家的儿女，用苕麻做成相对舒适耐穿的“麻窝子”鞋送给红军。

在武装斗争方面，城口苏区人民和地方赤卫队，积极地配合红军的多次军事行动。左岚乡的陈良魁是当地游击大队长和村苏维埃主席。1934年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，他发现地主袁华中帮敌人打探红军行迹，立即报告上级。红军将计就计，通过伏击全歼敌军一个连。当时，全县成立的7支赤卫军、16支游击大队、30多支游击小队、6个童子团，为维护社会治安、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保证红军后勤供应方面，城口人民更是倾尽所有。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，正好遇上旱灾、虫灾，粮食歉收。《城口县苏维埃创建史》书记录了对曾任红三十三军295团司号班班长刘武彩的采访。刘武彩泪流满面地说：“在城口战斗期间，是城口人民养活了我们。只要是能吃的东西，他们就送给我们吃，有的人家把看家狗都杀了送给红军吃。”

据不完全统计，红四方面军在城口战斗期间，城口通过各级苏维埃政权捐粮10多万公斤，打草鞋5000余双、编斗笠2000多项，并捐献了大量的蔬菜和肉类。

军爱民、民拥军。军民以苏维埃政权为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城口人民革命的热情熊熊燃烧。

弘扬红色文化

高燕镇红军村的村道，如银白的飘带，缠绕在青山中。它曾是运输锰矿石的道路，现在经改造连接起了大山深处的红色历史陈列室、红军哨台、红军医务所旧址、村苏维埃旧址等红色景点。

“红军村有相当长一段时期吃的是‘资源饭’，污染大。还有不少群众在锰矿开采中得了矽肺病，因病致贫。”高燕镇党委书记高军说。

近年来，红军村作为全市唯一以“红军”命名的行政村，通过挖掘和发展红军文化走出一条“红绿结合”的路子：重新标注红军历史遗址遗迹11处，收集红军故事形成5万字资料，建设红军村纪念馆、红军步道等红军纪念设施，开展“走一段红军路、种一棵红军树、吃一顿红军饭”等“八个一”活动；在扶贫帮扶集团的支持下，种植辣椒、萝卜等高山反季蔬菜，发展起150亩的绿色优质稻、70亩的荷塘，并大力开展乡村旅游。

“红军村是我们设计的县内红色旅游线路中重要的体验点，预计今年七一前后就可推出这条红色旅游线路。”城口县文旅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线路以苏维埃政权纪念馆为中心，辐射双河、庙坝、坪坝等乡镇。其中双河将重点介绍李家俊领导的城万红军历史，庙坝着重介绍李先念所在的红三十军足迹，坪坝侧重介绍王维舟率领的红三十三军战斗史。目前，这些遗址已基本完成修缮和部分布展陈列工作，正在结合挖掘到的红色故事开展主题教育设计，便于引导游客追忆光辉的苏区历史、感受城口独特的红色文化，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。



▲一位老人带着孙子在城口县的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参观。（本报资料图片） 记者 齐岚森 摄/视觉重庆



▲城口县城旧貌。

（城口县人大陈国心供图）



城口苏维埃政权纪念碑。（本报资料图片）